

補拙書屋文集

黃弗同 著



补拙书屋文集

黄弗同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补遗书屋文集

黄荆同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 珞珈山)

华中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0.625 字数 260千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 7-307-00593-X/I·33

定价：4.35元

前 言

《补拙书屋文集》终于有机会出版了，我感到高兴，也有些不安。在目前出书难，出学术著作尤难的情况下，能出一本论文集，确非容易事，因此感到高兴；另一方面，考虑到书市行情看落，出版这一类学术性著作，虽然有一定社会效益，但是经济效益不会好。心中颇为不安。在这里要感谢关心这本书的领导同志和出版界同行们，没有他们的关心与支持，这本书是无法问世的。

我在五十年代起开始从事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陆陆续续写过一些论文、杂著，业余也写过几个电影剧本和一些诗词。三十多年来，自己的学术见解有变化和发展，过去认为写得还可以的，如今重读的时候，便感到不甚满意了；有一些文章读起来甚至感到如芒在背，坐立不安了。这也许是好现象，说明自己还多少有点长进。我从不同时期的著作中挑选了部分论文和作品，按类编辑成册，本想作一番修改再拿出来，但考虑到更改多了有失历史原貌，除个别地方外，未作什么更动。这样一来，不妥和错误的地方就多了，请读者谅解，指正。

这本文集中的大部分论文均先后在刊物上发表过，现在就不一一注明原载刊名和发表时间了。本文集共收四类文章和作品：第一类理论语言学，收论文六篇，附《语言学讲座》十二篇；第二类具体语言学，收论文五篇；第三类文史杂论，收论文四篇、《读书偶记》十四则；第四类创作部分，收《曹雪芹》（电影文学剧本），并选录诗词计一〇一首、赋一篇。第四类作品绝大部分均未发表过。本文集虽然是不同类别论著的蒐集，有点驳杂，但却能反映我的治学生涯。前贤文集中也不乏按著作类别编辑成册的例子。

顺便谈谈“补拙书屋”的事。十年动乱期间，我住在一间阴暗狭陋的小屋中。八十年代初，全家搬进了新建的两室半一厅的顶层寓所。令人高兴的是，我终于有了一间十二平方米的书室，墙边书架上摆满了图书，在这里我可以用功补拙了，因而署名曰“补拙书屋”。搬迁之日，我写了一首小诗：“室藏书卷三千轴，窗纳湖山十二时。最喜楼高能望远，万家忧乐寸心知。”伏案之余，有时抬头近望桂子山的葱翠树木，远眺东湖的苍茫烟水，心中装满了世界。

今后在这里也许还能写出点东西来。想告诉读者的就是这些。

黄弗同于补拙书屋

一九八九年春节

目 录

前言.....	1
语言学研究中的哲学方法论和具体方法论.....	1
语言发展内因初探.....	8
再论语言发展的内因.....	16
语言、言语和外语教学浅议.....	26
谈“语感”.....	33
谈改进理论语言学教学的几个问题.....	37
[附]语言学讲座(十二讲).....	46
论典故——诗歌语言研究.....	90
成句初议——俄语的谚语、俗语和成语.....	100
论俄语同义词.....	110
汉、俄语词义对应问题.....	168
略谈说明名词的第二格名词.....	176
谈陆游的农居诗.....	183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读克雷洛夫寓言诗散记.....	189
普希金文艺思想简论.....	198
孙武遗稿《武昌革命真相》读后记.....	215
读书偶记.....	220
曹雪芹(电影文学剧本).....	231
补拙书屋诗词选.....	299
学步集.....	300

新声集.....	305
弹泪集.....	309
迎春集.....	315
[附]黄鹤楼赋.....	328

语言学研究中的哲学方法论和具体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在语言学研究中有沒有普遍意义？哲学方法论与具体方法论有什么关系？这些是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

在语言学领域方面，由于马克思通晓多种语言，熟知语言规律，在许多著作中，他对语言学的重大问题都有所论及，比如在《资本论》中，除了人们熟知的名称与事物的关系的论断外，还提出了语言是“社会的产物”的思想。他指出：“使用对象当作价值规定，本来就与语言一样，是人类的社会的产物。”关于语言的发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虽然高度发达的语言也有一些法则与规定同于很不发达的语言，但构成语言的发展的，还是不同于这一般与共同之点的差别。此外，在他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圣麦克斯》中对语言与思维、语言与思想、意识的关系作了精辟的概括，提出了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的论断。特别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继承和发展了人类的全部智慧结晶和科学成果，创建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一认识世界和改革世界的科学体系。这是指导我们从事革命、生产和科学活动的普遍法则。学习、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及其他经典作家们的丰富的宝贵遗产，是我们语言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建国三十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及其语言学说的指导下，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制定了语文政策，规定了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拟定并且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而为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开辟了广阔领域。从普通语言学的研究、语言学各个分支学科的研究、直到语言应用的研究，包括各种语言辞书的编纂，语文教学的改革，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兴旺时期。

不过，三十多年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极“左”

思潮的影响、干扰和破坏下，语言学的研究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和损害，延缓了它的发展。因此，要继续发展我国的语言学，首先，要划清以下三个界限：

一、要划清过去“左”倾错误的干扰、破坏和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的界限。不能把过去那一套打棍子、整人的“批判”，以政治运动代替学术争鸣的方式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作风。这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作风完全格格不入的。但是，实事求是的同志式的学术批评是必需的，是促进学术进步的有效手段。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

二、要划清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和“清规戒律”、“条条框框”的界限。前者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普遍真理，是指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原则。它不是经院式的思辨哲学，不是捆綁手足的绳索，而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经过实践考验的唯一正确的思想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面前只承认有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而不承认任何“清规戒律”，“条条框框”；而后者是违背客观规律、主观臆测的限制，是不利于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的。

三、要划清语言学中的庸俗社会学的倾向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界限。前者是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牵强附会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是一种虚伪的花架子功；而后者正是我们所追求，也是我们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才能做到的。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指导作用。

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但是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在语言学中的指导作用，要分两个方面来讨论，一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言学遗产是什么，我们所说的指导作用是就什么而言？另一方面是语言本身的特点以及语言学的特点在哪些方面，应合乎规律

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当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科学上的贡献主要在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但是，由于语言的某些性质以及经典大师们知识渊博、涉猎广阔，直接或间接论述语言的著作是不少的，特别是一些重大的方法论原则问题，比如在语言的起源问题上，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就作过科学的论断，指出“语言是从劳动当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解释”。关于语言与思维统一的原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哲学笔记》中都有所论述。关于语言的发展，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等论著中也有所论及。此外，关于历史比较语言学、关于名称和事物的关系、关于民族语言政策，等等，都可以在经典著作中找到明确的论断。恩格斯还写过专门性的语言学著作《法兰克方言》。这些经典著作和论断，都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

然而，语言学涉及到的内容非常广泛，门类也繁多，在许多具体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并没有给我们留下现成的答案。由于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语言的研究也更深入，这样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就不能重复旧的东西，不能抱教条主义的态度。比如新兴的社会语言学，从着重研究语言的结构的传统方式，转向语言功能的研究；从研究孤立的语言形式，转向在具体环境中使用的语言形式的研究，把重点转移到语言与阶级、语言与文化、风俗习惯的关系等等方面。这门学科是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如果我们只看到经典作家们论述过历史比较语言学，而对社会语言学未加涉及，便拒之门外，这不是科学的态度。正确的态度是，学习、研究这门学科，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予以理论上的剖析。正如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所指出的：“在马克思主义里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

的固步自封、僵死不变的学说。”列宁的这段话是值得我们铭记的。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具体地说，是指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普遍作用。这是马克思为人类提供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是在研究和总结人类知识的一切具体领域的材料和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作为认识和实践的工具对具体的科学活动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并从科学活动的实践和新的成就中使自己的原则和原理更具体更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僵死的教条的总和，而是同生活一起发展的。这就要求我们依据语言的特点和规律在物质与意识、空间和时间、必然性和偶然性、因果性、发展的辩证性质、反映论等等问题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和发展。在语言学领域中我们是大有可为的。

当然，在每一门具体学科中各有自己的具体研究方法和原则，我们称之为“具体方法论”。这些具体方法和原则是为了完成某一任务达到某一目的而采用的具体方式方法。一般说来，这些方式方法不具有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的性质，比如语言学中的比较法、历史比较法、统计的方法、转换生成的方法，模糊逻辑的方法等等，都是从某一角度出发，解决语言中的某一具体问题的。正是这些方法能解决语言学中的某些问题，能取得一定的成果，我们应该学习并加以研究。即令在这些著作中某些理论概括方面具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成分和色彩，我们也可以加以合理的利用和改造，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治学态度。正如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谆谆告诫的那样：“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

另一方面，我们从语言本身和语言学的特点来分析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的指导作用，也就是说，在语言学中如何正确认识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首先，我们承认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作为社

会现象，既不属于基础，也不属于上层建筑，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语言本身并不具有阶级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语言观。语言学不直接研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直接反映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这是语言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的不同之处。

其次，人们可以从诸社会现象中抽取语言，暂时摒除与语言有关的其他因素，单相地封闭地进行研究；或者只取语言中的某一要素、某一局部现象进行微观的分析和研究。这些研究方法一般不具有世界观的性质。这种现象，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也屡见不鲜。以商品为例，商品本身无所谓阶级性，《资本论》这一伟大的无产阶级理论巨著就是从分析商品入手的。也可以因某种需要从另一角度研究商品，如商品的保护、商品的检验，等等，这些研究同样一般也不具有方法论的性质。

另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语言本身以及语言学领域还有一些不可忽视的特点。

首先，语言究竟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变化和发展是与使用该语言的社会共始终的。社会的变化、发展影响到语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语言观之一。要研究语言的发展规律不能不研究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条件及其变化，以及这些条件和变化予以语言的影响。这是许多尊重客观事实的语言学家所承认的，比如十九世纪初的语言学家洪堡特、索绪尔、梅耶、房德里耶斯等都从不同角度承认语言与社会的密切关系，尽管他们所作的理论阐述和我们的不完全一致。语言学界老前辈王力同志在《汉语史稿·绪论》中就郑重指出：“这一门关于汉语发展的科学，它跟中国史、首先是汉族人民的历史，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当然，不只是汉语史的问题，在语言亲属关系的研究、语言的分化与统一、方言的演变及其形成问题等等，都与社会的历史变化、人口的流动变迁、民族的交往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在这些问题上就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是一。

其次，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

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中不只一次地谈到语言与精神、意识的关系：“‘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接着更明确地指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这说明，一，语言一开始就和精神同时产生而互为依存；二、语言是“实践的”“现实的”意识。这是唯物主义的语言观，是我们探索语言与精神、意识，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的一把钥匙。我国先秦时代的“名”与“实”之争也罢，古希腊哲学家关于“词”与“物”之争也罢，实质上是哲学上的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争辩。一个语言学流派的形成，在理论上往往不得不求助于哲学，这是语言学史上屡见不鲜的，比如当代生成转换语言学的创造者乔姆斯基也承认自己是笛卡尔理性主义的信仰者，把语言看作是人类的一种先天知识，一种生物禀赋。坚持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的观点，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才能在语言理论的探索中，保持清醒的哲学头脑。

再其次，当代语言学的研究有从局部到整体、从微观到宏观、从单一到综合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是语言本身的被认识以及语言学日益开拓的结果。这种趋势是辩证法的胜利。因为事物本身，包括语言在内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和演变的。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不只一次地谈到辩证法的作用，曾经就自然科学的情况，说过一段发人深思的话：“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

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第二卷，第418页）

上面引证这一大段话，是想说明一个类似现象，即多少年来语言学领域中也有把语言“分成一定的门类”，“孤立起来”，

“撇开广泛的联系去进行考察”的类似情况。我们不禁会问：这种情况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没有？有没有局限性？是不是有点形而上学？这些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从方法论的高度去思考吗？

语言学中分门别类的研究，局部的微观的研究，确实颇有成就，也能解决许多具体问题，是很需要的。但是，如果自觉地在正确的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下，能全局地、宏观地、综合地进行研究，就能在更高一级水平上取得成就。钱学森同志在《我的文艺观》中谈到文学艺术的结构时说道：“部门内部也还有层次，一个一个台阶，逐步提高。”（《艺术世界》1982年第5期）在语言学结构中也有类似情况。

当代语言学已和其他学科产生了广泛的联系，引进了科学技术的新方法和新成就。语言学中的新成就也影响到其他学科。边缘学科日益发展。许多新课题需要有语言学介入其中，进行综合性、协作性研究才能解决。人们不仅对语言，而且对语言与其他事物、现象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日益深入。这本身就是活生生的辩证法。如果我们能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语言学中的指导作用，摆脱由于习惯而造成的局限性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的束缚，正确处理哲学方法论和具体方法论的关系，并运用于语言研究中，就能建造一级又一级“台阶”直到宏伟瑰丽的殿堂，从而开创语言学领域中的新局面。

我想，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就这么一个大问题费一点笔墨，不会是老生常谈吧。

（本文系参加湖北省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写于一九八三年）

语言发展内因初探

语言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内部矛盾，比如语言的符号性和表义性的矛盾，语音、词汇和语法本身以及相互间的矛盾，语言与思维的矛盾，书面语与口头语的矛盾，语言的分化与统一的矛盾，方言与民族共同语的矛盾，个人语言的某些特点与标准语的矛盾，语言的全民性与阶级、社会集团对语言的影响的矛盾，语言与言语的矛盾，等等。

这些不同性质的矛盾错综复杂地存在着，并且不断变化着。因此，可能时而是这个矛盾为主要矛盾，时而是那个矛盾为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有时转化为次要矛盾，次要矛盾有时上升为主要矛盾。比如从明代末年起至清代末期，就有人注意到了书面语与口头语的矛盾。可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同时矛盾本身也未激化，所以这个矛盾始终没有解决。到了“五四”时代，社会历史条件已经与从前大不相同了，书面语与口头语的矛盾就上升为主要矛盾，于是展开了一场新与旧、内容与形式的尖锐斗争，即文言文与白话文的斗争，其中，起着主导作用的是白话文。这一场斗争以白话文的彻底胜利而告终。就是在今天，书面语与口头语也不是没有矛盾的，可是这种矛盾已经转化为次要矛盾了，而另外一个矛盾，即方言与民族共同语的矛盾又上升为主要矛盾。尽管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不断变化着的、对语言发展起着不同作用的矛盾，但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它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决定着语言的发展。我们认为，这种矛盾就是语言的符号性与表义性的矛盾。

我们知道，语言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语言的结构体系，

它具有符号性质，构成语言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就是语言的物质基础所负担和表达的意义方面，也就是语言结构要素的辨义和表义的功能。这两个方面是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体。语言的符号性与表义性的矛盾就是内容和形式的矛盾。

十字街头的交通指挥灯、电报号码、旗语，古代的结绳编贝等都具有符号性质。可是语言作为一种信号，远比这些信号要复杂得多。语言具有体系性，它的整体以及各个结构要素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语言的符号性与其他信号的符号性之所以有质的不同，是因为语言是在人类交际活动中作为工具历史地形成的，也是在人类交际活动中历史地发展的。如果说，其它信号的符号与所表示的意义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可以根据约定者的需要而改变，如电讯密码那样，那末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就不同得多。词的语音外壳与事物本质没有必然的联系，是就语音与事物两者之间质的关系而言的，是从语言的起源、词的起源来理解二者的关系的。但是，我们要看到另一个事实。语言随着人类社会一起发生，在漫长的历史中，被各个时代的社会集体所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历史的广泛的约定俗成的符号体系，并按照自己的发展的内部规律而变化发展。这样，这种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可论证的联系。这种联系与社会的共同心理特征有关。例如，当新事物出现以后，人们要给它拟定名称，就必然考虑到它的某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可能与某些事物的现象相近或相似，为了在交际中，容易被理解和掌握，就不能不在与其意义有某些联系的词素的基础上创造新词。近代的“电话”、“电报”“飞机”、“拖拉机”等等新词就是这样出现的。这些名词并不是任意的偶然的语音凑合，而是受到构词规律的支配。语言中的基本词汇一般能提供构成新词的词干和格式。俄语中具有后缀-ец的名词构词类型，在俄语发展的前期就以词的形式进入基本词汇中，如купец（商人），писец（录事）、мудрец（哲人）。这种后缀有表示某种性质、职业的人的作用，现代一

些新词，如 комсомолец（共青团员）、ленинец（列宁主义者）、стахановец（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就是以-ец 为构词基础。因此，从语言内部来看，语音表示意义的“任意性”在一定情况下是有限度的。如果认为俄语中 сорок（四十）是任意的语音结合单位（从词源学看有其历史根源），那末，从某种程度看来，пятьдесят、шестьдесят、двенадцать（五十、六十、十二）等词的任意性就弱得多。

但是，语言毕竟具有符号性，语言的符号性保证了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近代机器翻译的研究给语言的符号性提供了新的论据。正是由于语言具有符号性，机器翻译才成为可能。从信息论的观点看来，语言是有极大基数的不等价代码。词是语言代码的符号集，客观世界的事物现象是代码化的客体集。音位是代码的元素，是代码的基本单位。值得注意的是，语言的这种代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按照自己的内部发展规律发展着的。不先明确这一点，就会将语言符号性理解得过分简单。

语言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语言的表义性。语言各个要素所表达的内容是广泛的。音位有辨义功能，词语有语法意义和词汇意义，语法有表示关系的意义。语言的每个结构要素和每个语言单位与形式都是有意义的。语言的表义性就是语言的交际功能的体现。语言没有表义性就不成其为交际工具，就会失去语言的作用。语言的表义性是第一性的，符号性是为表义性服务的。语言的表义性来源于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实践。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成果巩固地记录在语言中。马克思早就说过：“语言是思想底直接现实。”社会的发展影响到语言的发展，正是通过语言的表义性，引起它与语言的符号性产生矛盾。矛盾的对立的统一和斗争，就使得语言朝前发展。

语言表义性与符号性的矛盾贯穿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语言的交际功能对语言的两种属性提出不同的要求：一方面要求语言适应社会的变化发展，适应人们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又要求语言